

社会资本、经济绩效与经济发展

郭熙保 张克中

摘要: 社会资本是人们获得权力、决策、资源的规范、网络及组织。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信任、普遍的规范和协会组织。有效的社会资本通过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重复的影响机制,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资本理论的引入对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经济增长 发展

一、引言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一直重视国民财富的增长,但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许多显赫一时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正如萨缪尔森所说:“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有些国家贫困,还有待进一步的解释”。

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一直是一些经济学家不懈的追求。20世纪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由于它不适用于解释长期增长率的决定,而被索洛—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所代替。新古典模型认为,增长率不是依赖于投资,而是取决于技术进步率,并认为技术像“天上掉下的馅饼”是外生的,即世界各国技术增长率是一致的。由于以新古典模型为代表的增长理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国收入增长率的差距缺乏解释能力而蛰伏了近20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Romer, P.)、卢卡斯(Lucas, R.)等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探讨长期增长问题,导致了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罗默认为产出是由物质资本、劳动和知识决定的,而知识的数量又与投资率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对物质资本投资的报酬是决定增长率的最关键的因素。卢卡斯模型强调人力资本是增长率的决定因素,这些模型的重要假定是投资率和个人积累技术所花费的时间是外生的。当我们问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有些国家贫困,我们的答案是富国公民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使用新技术、投资更多。然而,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人民投资比别国多?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人民愿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使用新技术?“我们认为重要的原因是国家法律、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在起作用”。为真正揭开经济增长与发展之谜,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领域来寻找答案,尤其是以道格拉斯·诺斯(North, D.)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产权、市场结构、民主决定程序、制度安排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为解释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在这一理论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以社会资本(类似非正式制度)理

论解释经济增长。较有影响的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是诺斯和奥尔森,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不能由人均可生产性资源(土地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包括技术)来解释,制度和形式形式的社会资本,包括公共政策来决定一个国家的收益。此后,该理论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社会资本一词频频出现在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和杂志上,尽管这些观点还未像早期理论那样模型化,但他们的结论具有普遍的政策含义。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认为,“……能够对高质量增长起积极作用的力量来自于强化一个国家里的非正式机构,即所谓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

社会资本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不同的学科领域(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着不同的含义。社会资本一词由法国学者布尔迪厄(Bourdieu, P.)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科勒曼(Coleman, J.)199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中,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其实其思想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那儿,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市场需要某种道德情感。大卫·休谟认为,合意的道德行为或“道德情操”、“同情心”会支持新的经济活动形式。经济学家主要强调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微观经济层面讲,他们首先看重的是社会资本改善市场调节的功能;从宏观经济层面说,他们考虑制度、法律框架、政府在生产组织中的作用怎样影响宏观经济绩效。

最著名的从较狭义的角度将社会资本视为“水平协会集”(horizontal association)对社会生产力具有影响,这些协会包括民间承诺网络和社会规范(Putnam, R., 1993)。在此定义中,社会资本特点是便于协会中影响成员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另一种对社会资本的中观看法认为,社会资本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社会资本与家庭、一些社区组织以及为相互的利益促进协调与合作的基本规范(信任、互惠)联系起来。但社会资本也许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科勒曼

认为社会资本在调节某种行动具有价值时可能对其他人没有用处甚至有害。事实上,社会资本的这种含义不仅包含社会结构,而且体现了影响人际行为的总体准则。

社会资本宏观的观点包括社会和政治环境使准则完善,规范社会结构。它除了包括前两者观点里面水平关系和垂直阶层组织外,还涉及到正式的制度和结构,如政府、政治制度、法规以及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模式有很重要的影响。

社会资本三种概念被累进地拓宽,第一种定义包括非正式和局部的水平协会,而第二种定义强调阶层协会,第三种定义在综合前两者基础上将正式国家结构(政府法规)纳入其中。社会资本综合性的观念将微观、中观和宏观制度相结合,认为三者可以共存,并有相互补充的潜力。宏观制度可以带来一个提供相关条件的环境,微观制度可以在其中发展繁荣。

由于各学科知识背景不同,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理解有不同的描述,因而尚没有形成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首先,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思路基于个体所有,社会资本通过延伸可以在社会组织中存在,它体现的互惠的期望基本是不变的。其次,社会资本的使用促使其存量上升而不是像物质资本一样在下降。第三,社会资本具有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增加生产力的能力,可看作其他形式的资本投资的补充,而不是这些资本的替代物或竞争对手。当然社会资本也具有破坏容易而产生难的特点,并且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为更好地度量社会资本,我们将社会资本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信任、共同的规范、准则和习俗、协会。社会资本具有可行性的关键是发现了可衡量的测度标准——信任。信任有益于经济活动是因为它可增强对企业活动的信息流动,促进合作,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而不用花费大量时间了解别人,每个人能如预期的那样相信别人,这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资金。共同规范、准则和习俗是所有人相互认可或代代相传的行为准则。它们给予投资者进行投资的信心,相互认可的习俗保证他们不会违规,否则将遭到惩罚。这些术语有时被称为博弈规则,社会内在道德体系,反映的是个人控制他们自己行为的程度,正式规则由政府当局制定,诸如法律条例。而非正式规则用于规范每个人自身的行为,规则是一种偏好,表明个体怎样行动。社会资本的另一主要衡量指标为协会活动。普特南认为几乎任何协会的活动(保龄球协会、合唱团)都能产生信任。因而他非常重视社会的协会活动,并将其等同于社会的自由。他的批评者责难的是一个群体的信任能否自动地延伸到其他的团体,并且不同类型的团体产生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资本的“黑暗面”,它会破坏信用,阻碍创新,甚至产生消极的社会资本。格逊和伊克斯(Gaddy, C. & Ickes, B. W.)认为俄罗斯经济正被这种消极社会资本所困扰,后苏联的地方与国家精英分子为了相互利益,充分利用“关系资本”保持他们与政府官员及寡头政治集团的影响。

三、社会资本影响经济产生的经验分析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产生有较大的影

响,如的增长、公平和减轻贫困。“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与19世纪80年代,乃至14世纪的发展与社会资本都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协会和机构提供一种非正式的信息、协调行动及作出集体决策的环境。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帮助规避与市场失灵相关联的信息不充分。经济当事人经常作出无效的决定是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信息或因为一个人传播错误信息给别人而从中获利。制度可帮助传播充足、准确的信息使市场中个人能作出合适、有效的决定。我们知道经济行为要求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能在低成本高信任的环境中完成。处在高信任社会的人不需要过多担心被别人利用,签订合约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诉讼也不那么频繁,高信用的社会在实施协议时更少依赖正式制度,非正式的信用市场依靠良好的人际信用有利于投资,而不需要发达的金融中介。政府官员的高信用使其政策更可靠,政府政策信任程度的增加也有利于投资。信用也可刺激更大的投资和其他经济行为。这样,社会革新层出不穷,人力资本的积累更可能有较高的回报。相反,低信社会抑制创新,交易成本上升。个人事业的发展依靠亲戚、朋友、家族化形式。共同的准则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与信任类似。合作的准则可看作对狭隘的私人利益的约束,引导个人为各种公共物品作出贡献。内在的和外在的参与规范相联系的约束改变了囚犯困境的合作与背叛的成本和收益,有效地抑制了机会主义,降低了监督和实施契约的成本,提高了投资活动的收益。阿罗认为,每一种商业交易都有信用成分在其中,当然,交易需要时间,可以断言世界上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可用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

社会资本能够增进交易的可重复性,减少机会主义动机;能够形成社会互相信任的机制,为政治和经济交易提供便利;能够扩大信息交流,建立和传递信誉。这种特殊“资本”的功能也成为很多学者寻求为增长之源。没有它,社会将四分五裂,更遑论经济增长,环境持续发展,人们福利增大,像索马里、南斯拉夫、卢旺达便是我们身边惨痛的教训。相反东亚奇迹可以用社会资本的作用来解释,传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只能部分地解释东亚的高增长率,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创造社会资本为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增强了效率,便利了信息交流,促进了政府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合作环境。索马里政府在1991年秋以后,国家受民间混乱与收入下滑的困扰,而布萨苏这一港口城市是个例外,因为当地一个将领组织了一个民众支持的安全部队和民族法庭,通过这种社会资本投资,使贸易繁荣、收入得到改善。

从理论上讲,社会资本的确可以增强生产要素组合的效率,增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回报。换言之,它不是生产函数的一种投入,而像技术一样,是整个生产函数中一个转换要素。世界银行(2001)指出了社会资本对发展的影响:在教育中,在学生的父母及公民对孩子的教育福利有积极兴趣的社区,教师更为尽职,学生的成绩更好,学校的设施更好地用于该社区;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受民间团体支持和监督的医务人员工作更为认真;在农村发展中,有较高社会资本的村镇会更多地使用信贷和农业化肥,在道路修建中有更多的村级合作。较有影响的从实证角度研究社会资本的是莱克

和基费 (Knack, S. Q. & Keefer, P., 1997) 利用世界价值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 1980-1994) , 从实证的角度考察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考察的指标是信任、合作准则与协会, 他们运用 29 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从中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 第一, 信任与民间合作对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第二, 与普特南研究意大利地区经济差异得到结果相反, 协会活动与经济绩效没有太多联系。第三, 信任与民间合作较强的国家拥有正式制度, 有效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力, 并发现信任对于贫穷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 因为在这些国家法制和金融部门更加脆弱。当然, 建立正规的法制和信贷机构在那些低信任度的国家是特别重要的。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一个核心的因素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一些学者认为信任是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扎克与莱克 (Zak, P. J. & Knack, S., 2001) 提供了一个异质群体交易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低的信任环境减少投资率和增长, 高信任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他们通过跨国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

信用与民间共同准则对经济活动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 而协会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见仁见智。普特南考察了意大利各地经济水平成功与失败结果后认为, 广泛地参加民间组织是高社会资本的表征。正因为意大利北部大量自愿组织的协会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而南部协会非常少, 导致了北部地区的经济绩效较为突出。这些协会为成员反复灌输合作的习惯, 形成集体的责任和团结。然而, 当一个集团的经济目标与其他团体或个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团体组织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奥尔森 (1992) 注意到水平协会将阻碍经济增长, 因为协会组成的特殊利益团体通过院外游说左右政府政策, 而加强了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协会的活动可能可以增强信用, 但也可使寻租行为有机可乘, 协会对于信用来讲是一种双刃剑的作用。那些孤立的、狭隘的或与社会的集体利益相矛盾的团体和网络 (匪帮、毒品卡特尔) 就是为邪恶的而不是为生产性的目的服务的, 它们会阻碍发展, 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普遍的不安定。

四、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思路

回顾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历史, 从四五十年代结构主义主导地位的衰落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意识到, 经济学是不能被独立于历史、文化和政治之外的纯粹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突破性的发展,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大量引入和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使经济发展理论不断地得到充实。制度的引入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忽视制度的缺陷, 较为充分地考虑到制度对个体行为的约束。新制度经济学家以个人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为背景, 从法律和道德这一层面来理解制度, 并从抽象人性出发来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 同时也使用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的制度补充其理论。但诺斯对“历史的新古典解释也只是内生性尝试的失败”。普特南批评新制度主义者专于注重正规的、成文的制度, 而不太关注那些不成文的、非正规的, 却经历历史沉淀的制度, 即社会资本。“近些年来, 新制度经济学家也重视非正式约束, 特别是规范和网络, ……他们没有考

察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如何共同塑造制度和影响经济绩效, 也就是没有正式和非正式约束关系的性质理论, 关于制度效应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20 世纪后期, 人们开始从更广义的制度上定义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的引入为拓展发展的内涵, 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提供了诱人的前景。目前, 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包括罗伯特·贝茨 (Bates, R.)、彼得·艾文斯、阿夫纳·格雷夫 (Greif, A.) 等人代表的比较制度研究。该理论认为制度和经济行为根植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而为了充分理解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体所依赖的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应得到重视。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 因为, 在发展中国家, 经济契约表现为个人关系, 社会价值观和关系网对于生存和积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末, 斯坦福大学的阿夫纳·格雷夫构建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格雷夫的研究视角从关注经济体制表面差异及其绩效的影响, 发展到探索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依存关系, 并探寻经济体制差异性的根源及体制内部的深层次结构。经济体制内的结构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定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从历史因素层面并结合新古典的博弈论和历史经验归纳分析的方法, 力图揭示制度产生和变迁的作用, 将其研究视野不断从市场制度向非市场制度, 从制度安排向制度环境, 从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拓展, 尤其是重视影响制度诸因素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格雷夫认为,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社会组织起了重要的作用, “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仅是禀赋、技术和偏好的函数, 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社会组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社会组织自身反映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进程。历史的和比较制度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发展演变的理解, 因为这种进程从本质上讲是有历史根据的。而且这种分析为研究制度的演变和文化、社会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历史的视角和多样性。”

格雷夫正是从制度内部的角度探索经济发展绩效及道路选择的差异性。他通过对地理位置等情况相似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展开历史的比较分析, 不同的制度选择把热那亚和马格里布的经济与社会引向不同的发展道路, 热那亚人和马格里布人不同的文化遗产及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理解。马格里布人受穆斯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 应该彼此负责, 在马格里布人之间, 始终保持着能够顺利传递信息的社会纽带, 但在对外贸易代理关系中, 马格里布商人都拒绝与非马格里布商人合作, 即采取仅限社区内的封闭的方式扩大对外贸易代理关系。热那亚人受基督教的影响, 将个人而不是社会集团放在中心位置, 形成了一种个人主义社会, 在海外贸易扩张中, 热那亚商人采取了无社区限制的开放方式扩大海外贸易代理关系, 并逐步建立了许多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制度安排, 如提货单制度、保险制度。马格里布商人习惯于非正式地签订契约或解决争端, 政府和法律却很少对经济行为提供有效的约束, 因而没有像热那亚人那样建立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相应的法律体系和保障制度。历史的制度分析揭示了一个社会内

部经济、文化、社会特征之间的复杂性。马格里布人之间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社会的封闭性和集体的社会信息网络。而热那亚商人之间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社会。正是这些差异性导致了两个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格雷夫指出,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基督教的个人主义社会或许已播下西方世界兴起的种子,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可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的根源。国家的结构及其介于公民社会和公共生活程度的社会组织共同构成了一国发展的成败。历史比较制度分析制度及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是一个突破,从分析工具角度上使用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研究方法,主要使用了“进化博弈论方法”和“重复博弈论方法”。同时突破了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表面差异性及其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理论,从社会文化、传统、公民行为规范、网络等角度寻找制度的选择及其差异性的根源,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融合。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确保人们共同创造价值的日常规范和网络。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保证人们共同创造价值的日常规范和网络,另一种拓展发展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关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政府究竟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起什么作用的问题,经济学家常常来回徘徊。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题为《东亚奇迹》一书为代表,系统介绍了东亚经验,认为东亚奇迹是政府科层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随着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触发了对政府作用的新争论,但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并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让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世界银行在谈到发展思维转变中强调“政府在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一套简单的规则告诉它们要做什么,除了普遍接受的规则,政府的能力、国家的发展水平、外部条件等诸多因素决定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效率决定了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当代发展研究的主体面向民族国家、理性的个人和公司时,介于个体和国家之间的和调节国家与市场的空间制度安排,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未将两者有效的结合,社会资本理论把微观层次的个体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起来并作了开创性的努力,试图解决新制度主义两个层次对立的问题。就社会资本理论中政府的作用问题存在两种思路,一种观点持有者称之为非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主导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相反有时对经济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资本只能在非政府领域内产生,政府支持的活动与社会资本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政府行为可以破坏却不能创造社会资本。持有另一种相对立的观点的人称之为“国家主义者”,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正和博弈,非国家主义者的观点不合历史逻辑。事实上,社会资本需要正式的国家制度去培养与呵护,政府与社会自发团体是一种共生的、协同关系,公民参与巩固国家制度,有效的国家制度为公民参与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公共机构的参

与推动了普通公民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稳定与发展,促进这些规范和网络运用于发展目标。两者争论的焦点是社会资本能否通过政府政策来构建。非国家主义者认为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政府妨碍市场和社会网络的最优调节功能,本能地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增长。相反,国家主义者认为社会资本需要正式制度促进其繁荣。

关于社会资本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人为而不必要的,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考虑。斯图恩(Stone)等人在比较巴西和智利制造产业时说明两者的互补性,巴西有一个繁杂的管制体制,法律随意性强且诉讼昂贵,商人只有依靠非正式日常交易与消费者、供应商做生意,尤其是涉及到信用时,这种非正式规则建立的信息体系需要高成本维持信誉。企业主采取的风险规避策略从根本上阻碍了生产扩张。相反,智利具有简明的法律体系使合约执行更安全,以致于较少出现违约或重新谈判现象。两国的比较表明,非正式协会能代替法律和有限的法律体制,强调了宏观层面社会资本使商业运作顺利进行的作用,尤其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透明、公平的环境作用。社会资本微观与宏观的互补性不仅影响经济结果,而且相互促进,宏观制度为微观制度提供生存和繁荣发展的环境。大量事实已证明有效的政府与社会资本是可以协调的,佩特罗(Petro,N.,2001)在考察自然资源匮乏、农村人口众多而且缺乏老工业基地的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地区时发现,该地区之所以能吸引仅次于莫斯科的大量海外投资,是因为在苏联解体后培育了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并认为政府在建立社会规范和提供共同文化框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简要评论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还处于初期,关于它的概念范围的界定及实证研究还有待完善。正如弗兰西斯·福山(Fukuyama,F.)所说,无论是社会学家还是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广泛的使用都感到不高兴,社会学家觉得这是经济学侵入社会学领域的又一表现,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概念含糊不清,难以衡量。但它还是为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近10年来,社会资本已经变成发展词汇中的重要名词。有关的理论和实践已将发展思维从寻求一种单一的、主导性的政策处方中扩展开来,发展的思维在转变。“程序和政策同样重要。依靠协商参与和具有透明度的程序制定出来的政策其结果更容易持久,包含这些程序的良好治理制度对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还应该包括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建立、培养和维护社会资本。

从理论上讲,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资本理论在分析经济制度时引入了社会和组织关系,并指出社会关系不仅是经济功能行使的基础,而且对经济活动有着持久的、独立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将价值观、文化、历史和道德规范纳入了分析的框架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的传统,因

此有人称为“古典主义的复兴”。使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动因的解释跳出了传统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巢窠,开始关注到一个社会的文化和规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主流经济理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个人关系及其社会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弗兰西斯·福山(Fukuyama,F.)认为,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的经济学80%是正确的,还有20%新古典经济学只能给出拙劣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揭示了货币与市场的本质,假定人类是“理性的个体追求功利的最大化”,但却忽略了人是各种社会集团中的一员,以及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非理性、非经济、持久起作用但变化缓慢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追求。

(2)社会资本理论本身是对发展理论的延续。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增长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和物质资本,20世纪60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则引入了人力资本概念,福山则全面研究了社会资本,他认为在分析传统的资本和资源时,也需要考虑相对社会资本的实力,社会团体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而且更明显的价值。在主流的经济理论中,新增长理论比新古典模式更注重社会结构,罗伯特·卢卡斯也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性的社会活动,各种人群都牵涉于其中,但是其积累方式又无法从物质资本的积累中找到参照。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虽各有优势,但都忽视了对社会本身、文化、理性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视和深入研究,往往对这些重要问题看作是研究框架中的外生变量或置于分析框架之外。实际上,这些以前被视为既定的、应然的因素通常是制度变化和革新力量发挥作用的中介。

(3)社会资本理论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很有开创性。社会资本的异军突起得益于其提供了解决激励相容问题的新视角,通过暗含合作互利的假设前提来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实际上,新制度主义一直想将这两个层次的分析结合在一起,但由于范式框架的限制而难以化解两个层次分析之间的矛盾。而社会资本首先在概念上就充分肯定了社会对个体行为选择的约束和推动,没有把人和人和社会对立起来,没有过分追求定量分析和数理模型的倾向。在经济运行分析中,将社会资本看成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间物。并认为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则和程序的情况下,社会资本解决内部潜在冲突的能力,网络范围内的博弈合作解的出现,使个人自愿地为组织或社区提供公共物品。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者认为,“正规制度与组织成员的利益一致时,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控制程序很大程度上包括了监督和执行成本,在此情况下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导致高的经济和组织绩效。当统治者或公司对这一原则置之不理时,他们可能面临相反的社会规范和网络组织抵制他们的目标”。

(4)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网络配置资源的这一新形式。主流经济学从资源稀缺性出发,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提供了除市场之外的国家和厂商的资源配置方式。威尔伯(Wilber,C.K.)和詹姆斯(Jameson,K.P.)在《经济学的贫困》中指出,人类实现生存、自尊和自由这三大目标,就须同时采用市场、科

层制的管理及友爱等三大资源配置体制。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网络配置资源的这一新形式。网络式的资源配置和交易,不是通过分散的交换和行政命令来实现,而是通过网络来实现,其成员参与互惠、符合意愿和相互支持的行动。美国学者林南通过美国就业问题的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即使是在美国社会,社会网络也是人们寻找工作的基本依赖。的确,在现实生活中网络传递的信息比市场获得的信息更密集,比等级沟通获得的信息更自由。同时,网络效应的制度支持就是有保障的信任,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可改变“公用地悲剧”为“公用地繁荣”。社会资本理论中网络分析方式增强了经济学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力及其解决现实生活的能力。

注释:

- Jones,C.I.,1999.IntroductiontoEconomicGrowth.W.W.Norton&CompanyInc.pp.161.
- 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文版,13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 Putnam,R.,1994.CommentonTheInstitutionsandGovernanceofEconomicDevelopmentandReform.ProceedingsoftheWorldBankAnnual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
- 林岗等:《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的本质的两种解释比较》,载《经济研究》,2000(6)。
- Nee,V.,1998.NormsandNetworksinEconomicandOrganizationPerformanc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8,No.2,pp.85~89.
- Greif,A.,1994.Culture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y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2,No.5,pp.913~950.
- 世界银行:《迈向新世纪——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2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 Barro,R.J.andSala-I-Martin,X.,1995.EconomicGrowthNewYork:McGraw-Hill.
- Greif,A.,1994.CultureBeliefsandtheOrganizationofSociety:AHistoryandTheoreticalReflectiononCollectivistandIndividualistSocietie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2,No.5,pp.913~950.
- Greif,A.,1998.HistoricalandComparativeInstitutionAnalysis.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8.No.2,pp.80~83.
- Nee,V.,1998.NormsandNetworksinEconomicandOrganizationPerformanc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8.No.2,pp.85~89.
- Petro,N.N.,2001.CreatingSocialCapitalinRussia:TheNovgorodModel.WorldDevelopment,Vol.29,pp.229~244.
- Knack,S.andP.Keefe1997.DoesSocialCapitalHaveanEconomicPayoff?ACross-CountryInvestigatio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November1997),pp.1250~1288.
- Zak,P.andKnack,S.,2001.TrustandGrowth.TheEconomicJournal,111(April),pp.295~321.
-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 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李惠斌、扬雪东:《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N)